

烟台故事

往事如昨

牟平金牛山传奇

张洪财 刘甲凡

在牟平区水道镇政府驻地东南方向一公里处，有一座小山叫金牛山，是咱胶东地区颇有名气的黄金产地。据1936年版《牟平县志》“矿产篇”中记载：“金牛山的金矿脉，南起乳山，北至玉林店乡哈狗山，长约30公里，均有规模不等断续露出的含金硫化铁矿石矿脉。自隋唐以来，历代均有开采。”“金牛山矿曰茅山，矿床生于花岗岩片麻岩中，石英脉每吨含金约三钱五分，清光绪二十年开采颇盛。”围绕着那些灿灿诱人的黄金，千百年来，这里发生过许多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。

两个美丽的传说

金牛山最初叫茅山，后来缘何改称金牛山？在1990年版《牟平县志》“民间传说”篇中，记载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……

古时候，有两个牧童在金牛山（今水道镇）放牛。一天，一个牧童说：“咱放了9头牛，吃草时却是10头，回家时还是9头。”另一个说：“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一头老牛，说它是金牛，住在这个山内。老牛还说，我是它的主人，要想得到它，只要把瓜蒂像钥匙那样一扭，山就开了，便可牵它回家。”

牧童的话被一个“坏肠子”的人听到，他偷偷观察：牧童把牛赶到山坡后，果然有一头金牛从山内钻出来，混在牛群里吃草，吃饱后又钻进山内。“坏肠子”暗自窃喜，只要找到瓜蒂，就可以得到金牛了。可是，究竟瓜在哪儿？“坏肠子”和牧童都不知道。于是，“坏肠子”就在山的周围到处寻找。

山的东面有一老翁，种了一片西瓜，长势喜人。当西瓜六七成熟时，一天夜里，突然下了场冰雹，把西瓜打得稀烂，唯有一棵瓜蔓完好无损，上面只长了一个西瓜。老翁蹲在那个西瓜旁，心如刀绞，泪流满面。“坏肠子”见状，心想，这瓜准是开山的钥匙。便上前拜见老翁：“老人家不必伤心，晚生愿以百两金子买下此瓜，以接济老丈生计。”老翁听了半信半疑，当接到黄金时，才作揖致谢。

“坏肠子”日夜守候在瓜旁，唯恐它飞走。当瓜熟了，他便小心摘下来，面对金牛山一扭瓜蒂，山裂两半，只见一头金牛正在啃着石头、沙土，边吃边扇着金砖、金条、金豆，一堆一堆，金光闪闪。“坏肠子”喜得扔下西瓜，上前抓住牛尾巴，尽力往外拽。金牛回头一看，不是主人，便“哞”地一声吼叫，尾巴一甩，把“坏肠子”摔倒，冲出山外，直奔南海龙宫。这时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山又合上了，把“坏肠子”关在山内。

除了以上《牟平县志》的记载，在牟平民间还有这样的传说：那头金牛一个劲地往前跑，跑到“落脚山”前的小村子时，纵身跃上一个大石凳，在上面蹬了一下，留下一个牛蹄印，这个小村从此得名“落脚屯”，后来演变为罗家屯。金牛不歇气地向前跑，经过孙家庄时已是黎明，就停下脚扇了一泡屎。一位农夫正好出

来捡粪看见了，就拿铲子去铲，可是怎么也铲不动。仔细看时，却是一泡金屎，一下子发了大财，这个村也因此被戏称为“史（屎）家庄”。金牛再向前跑时，遇到一个老太太正在碾谷，金牛此时又饥又饿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冲上去就吃磨盘上的粮食。老太太急了，赶紧用簸箕去挡，后来这个地方被人称为“簸箕掌”。

金牛跑啊跑，一直跑到南海边，纵身跳入海水中不见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人们就把茅山称为金牛山了。

一段列强入侵的屈辱史

清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山东四府（济南、东昌、泰安、武定）道台李宗岱于金牛山采金，办事处机器房设在罗家屯东北河滩内。

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，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胶东，清政府与德国立约，准开登州五矿，本县茅山、桂山等矿均列约内。清德成立了“华德采矿公司”。立约后，德国人在金牛山铺设了轻便铁路，并在茅山后麓建筑西式楼房一座，备职员办公膳宿。

德国人先后在金牛山矿脉开了五处矿坑，一是在金牛山北麓向南开，坑巷宽大，内有横向五道，均向东开；二是在铜锡山东坡向西开，至矿脉转西南；三是在茅山北端洞口向南开，中间有东西隧巷；四是在金翅岭南坡向东北开，至矿脉转向北，向上开通山顶；五是在轨道山西南坡向北开，又在西坡、东坡各开坑一道，转向南北打。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合同期满，我国本应收回登州矿务，但由于德国人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，登州五矿权力仍然操控在德国人手中。

1907年，清政府又与德国签订合同，同意延期2年收回登州矿权。新合同签订后，山东各界人士对德帝国主义继续霸占我国矿权的侵略行径深为愤慨，成立了“保矿会”，提出“坚决收回茅山五矿”，表示“如不废约，当限制开矿，抵制德货以为后盾”。德人迫于各界反对，又发现各处矿苗不足，恐开矿亏损，提出要清政府拿出白银80万两，方准赎矿。对于德商的讹诈，本应据理驳斥，但山东新任巡抚孙宝琦害怕引起外交纠葛，卑躬屈膝，与德人勾勾搭搭，于1909年以34万两白银将五矿赎回。

1938年，日寇占领了牟平。1940年2月，日军在水道修建了据点，随后就“占山为王”开办金矿，并以各种方式挟持水道周边的青壮年村民下井采矿，矿工们深受其害。直到1944年，八路军拔除了日寇的水道据点，金牛山才真正回到了牟平人民的怀抱。
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我胶东解放区政府成立了东海采矿办事处，在金牛山腊子港开采矿石，生产黄金和硫磺。同时，在莒格庄曲家口成立兵工厂，用在金牛山生产的硫磺制造军火，支援前线，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。

消失的布票

赵国经

星期天整理书柜时，翻出了一些票据，大都是四十多年前市面上流通的布票、粮票、油票等。看着那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、颜色老旧的票据，我捏起一张布票仔细端详，尘封的记忆立即浮现在眼前。

布票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消失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，曾经主宰着老百姓的穿衣大事三十年之久。布票没有统一的式样，各省有各自的布票。山东省布票为长方形，面额为一寸、五寸、一市尺、五市尺、十市尺不等。布的供应品种也很单调，无非是卡叽布、华达呢、灯芯绒、漂白布等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“文革”结束，国人的穿衣标准不外乎中山装、建设服、军便服和工作服，服装颜色也以蓝、灰、黑以及军绿色为主。夏天是白衬衫加蓝裤子，连穿裙子的女性都不多见。穿着如此单一，除了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外，更重要的是轻纺产品极度匮乏，市场供应紧张，人们购买成衣或布料都需要布票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家中姊妹七个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父母原来都是教书匠，因家中孩子多，母亲便辞去工作专职在家照顾我们。家中没有劳动力，父亲的工资勉强够全家在村里购买口粮，有时还拖欠生产队口粮款。从孩童直到初中毕业，我穿的衣服全是哥哥姐姐穿小的衣服改成的。当然哥哥姐姐也是如此，老大穿小了给老二，老二穿小了给老三，以此类推。我最小，只能穿哥哥姐姐剩下的。因为个子长高了，母亲就找点颜色相近的旧布接上一截，所以我的衣袖、衣服下摆和裤腿永远都是两三种颜色。那时女式裤子一律是侧开口的，我因穿改装女裤没少遭到小伙伴们的嘲笑。

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改衣服和在旧衣裤上缝补丁是许多母亲们的必修课。直到衣服实在不能穿了，那些零碎的布片也会成为做鞋帮、鞋垫的材料。供销社的鞋子就是清一色的“解放鞋”，只是尺码不同而已。大人买一双不到穿烂了，是舍不得丢掉的。小孩子正值生长期，脚丫子一个劲地疯长，哪家也舍不得花钱给小孩买鞋子。于是村子里的半大孩子都打赤脚，光着脚丫到处跑，经常不是这个碰破了脚趾头，就是那个脚上扎了荆棘刺。只有到了冬天，小孩子才能穿上一双用蒲草编的“嘎哒鞋”，里面塞上棉絮或玉米皮，虽然走路嘎哒、嘎哒响，但却实用、暖脚。我经常穿母亲做的棉鞋，勤劳的母亲经常一针一线地纳鞋底，浆洗旧布做鞋帮，冬季来临之前给我们备好棉鞋。夜里我们都睡下了，只有母亲还伴着小油灯，缝补衣服和袜子，一忙活就是大半夜。

小时候母亲经常带我回姥姥家。听母亲说，舅舅每次来我家，总是抱怨姥爷把母亲嫁到穷山沟了。所以每次回姥姥家，要强的母亲都要到邻居家借一套新衣服把我打扮一番，以显示我家的生活不是舅舅想的那样。邻居家有个小哥，身材与我差不多，爸爸在工厂上班，厂里发照顾布票，给孩子做了一套小制服，惹得全村的小伙伴好一通羡慕。平日里邻居小哥也舍不得穿，但那套小制服曾多次借给我穿着走亲戚。那时小孩子都巴望着过年，因为只有过年，才有好饭吃、新衣穿。其实即使过年，所谓的新装也都是大人旧的旧衣服经过漂染、改小后翻新而成。邻村有一个染房，冬闲时节，收布的“染匠”举着货郎鼓，几天就到村里转一趟，收了待染的布，漂染翻新后再送来。

直到1976年我上高中，母亲才带我到小卖部买了双“解放鞋”，到会缝的亲戚家量身定做了一身军绿色“中山装”。于是，15岁的小男子汉有了第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。

那年代穿一身旧军装，或者是一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也曾是一种时尚；置办一件“的确良”衣服，可以引领服装新潮流；一套哗叽料的制服，绝对属于奢侈品。非结婚这样隆重的场面，农村青年是穿不到的。那时农村孩子结婚，讲究几铺几盖和几身新衣。分配到各家各户的布票显然不够用，置办嫁妆除了自己攒两三年的布票外，一般都要到左邻右舍家去淘换布票和棉花票。因为布票和棉花票只能当年用，过了12月就废掉了。1978-1983年我在乡政府工作，每到新旧布票交替之时，总要受托为村里的街坊邻居到乡会计那里去兑换新布票。

后来布票成为最先被废除的票证。时过境迁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穿衣彻底摆脱了过去千篇一律的“蓝海洋绿海洋”，开始追求五颜六色、款式新颖的服饰，追求个性化的表现，甚至品牌效应。从布票年代的“一衣多季”到取消布票后的“一季多衣”，中国人在衣着上的变化速度，女人们赶时髦的热情，令人咋舌的购买力，常常令西方媒体发出惊叹！

如今我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有多少件衣服，小库房里各色鞋子一堆。爱人和孩子的衣服鞋袜更是数不胜数。有的穿过一两次，有的长期压箱底，因为款式落后或花色不称心等，每到换季时节服装就要淘汰一批。

总结现代人的服饰特点，那真是：男人包裹得越来越严，女人穿着越来越露；以前衣小是没布票，现在衣小是赶时髦……